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撰著

元朝史(下)

韩儒林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乔还田
版式设计:陈 岩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朝史(修订本)/韩儒林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
(人民文库)

ISBN 978-7-01-005694-4

I. 元… II. 韩… III. 中国-古代史-元代 IV. K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6119 号

元朝史(修订本)

YUANCHAO SHI

韩儒林 主编

陈得芝 邱树森 丁国范 施一揆

姚大力 刘迎胜 高荣盛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4 月第 2 版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60.75 插页:4

字数:78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5694-4 定价(上下册):11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第七章

元末农民大起义

第一节 元末社会矛盾的激化和起义的准备活动

一 元末社会矛盾的激化

元朝统治者长期以来推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政策,最后终于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元末农民大起义就是这种矛盾激化后的必然产物。

“开河”与“变钞”是促使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红巾军起义爆发后,社会上流传着一首《醉太平小令》: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①

这首小令揭露了元朝黑暗统治的“人吃人”本质和“黎民怨”的社会状况,指出了“开河变钞”是酿成“红巾万千”的“根源”,讽刺了“堂堂大元”自我造成“哀哉可怜”的悲惨局面。小令的作者虽然不是站在农民起义的立场上,却是“旁观者清”,分析得入木三分。

至正四年(一三四四年)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平地水深达二丈许,北决白茅堤(今河南兰考东北)。六月,又北决金堤。沿河郡邑,如济宁路

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三,《醉太平小令》。

(治今山东巨野)的单州(今山东单县)、虞城(今河南虞城北)、砀山(今安徽砀山)、金乡(今山东金乡)、鱼台(今山东鱼台西)、丰(今江苏丰县)、沛(今江苏沛县)、任城(今山东济宁)、嘉祥(今山东嘉祥)、曹州(治今山东菏泽)的定陶(今山东定陶)、楚丘(今山东曹县东南)、成武(今山东成武),大名路(治今河北大名南)的东明(今山东东明东南),东平路(治今山东东平)的汶上(今山东汶上)等许多地方都遭受水灾。水势沿着运河北浸安山(今山东梁山县境),涌入会通河,蔓延至济南、河间(今河北河间)两路地域。黄河泛滥如此严重,受害地域如此广阔,是历史上所罕见的。

黄河大水,给沿河两岸的广大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先是大水使农田被淹,民屋冲塌,诗人高志道写道:

屋倒人离散,风生水浪滔;
周围千里外,多少尽居巢!①

接着又是大旱,诗人迺贤写道:

河南年来数亢旱,赤地千里黄尘飞;
麦禾槁死粟不熟,长铲挂壁犁生衣。②

水灾、旱灾之后,又是瘟疫蔓延。黄河两岸的人民遭受着沉重的灾难,过着饥寒交迫、痛苦万状的生活,据估计,当时饥民的总数达到一百万户、五百余万人。余阙说:“至正四年,河南北大饥,明年又疫,民之死者半。……民罹此大困,田莱尽荒,蒿藜没人,狐兔之迹满道”③。

黄河决堤后,也直接影响到元朝政府的国库收入,河水溢入会通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将坏两漕盐场,妨国计甚重”④。漕运和盐税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支柱。通过漕运从南方各地运来大量粮食、丝绸、奢侈品;盐税收入则占政

① 《元诗选》癸之庚上。

② 《元诗选》戊集,《金台集》。

③ 余阙:《书合鲁易之作颍川老翁歌后续集》,《青阳先生文集》卷八。

④ 《元史》卷六六,《河渠志》三。

府总收入的十分之八^①。如果漕运和盐场遭到破坏,必然带来严重的经济危机。因此,当贾鲁于至正九年(一三四九年)提出治河方略后,立刻得到右丞相脱脱和元顺帝的批准。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年)四月,元顺帝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领河南、北诸路军民,发汴梁(今河南开封)、大名等十三路十五万民工及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十八翼两万军队,到河上服役。这两万军队主要是监督河工之用的。根据贾鲁的方案,开凿自黄陵岗南至白茅、黄固、哈只口,西至阳青村,共二百八十里,为新河道,然后塞南行之旧河道,使黄河由新凿之河道至哈只口进入故道,即东去徐州,合淮河入海。

黄河泛滥后七年来,沿河两岸的贫苦农民遭受了洪灾、饥荒和瘟疫,长期在死亡线上挣扎,本来已是怨声载道,对元朝统治充满了仇恨。现在被强征为河工后,伙食和工资又遭到治河官吏的克扣,这些半饥半饱的河工,在军队的皮鞭下担负着极其沉重的劳役。他们实际上是被驱使的奴隶。怨恨、愤怒的气氛,笼罩着治河的工地。由于河工来自黄河南北的四面八方,因此,河工的怨恨和愤怒集中表现了中原地区广大受灾的劳动人民的怨恨和愤怒。

元顺帝即位后,由于对贵族、官僚滥行赏赐和宫廷的挥霍浪费,造成国库入不敷出。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右丞相脱脱准备用变更钞法的办法来解决。至正十年(一三五〇年)冬,吏部尚书偃哲笃、左司都事武祺为迎合脱脱的意图,建言变更钞法。十一月,元顺帝下诏:“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②至正十一年,置宝泉提举司,开始铸造“至正通宝钱”,印造“至正交钞”,令民间通用。这次变钞的办法是:一是发行“至正交钞”,使它与“至元宝钞”并行通用,但至正交钞的

① 《元史》卷一七〇,《郝彬传》。

②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

价值比至元宝钞价值提高一倍,加上宝泉提举司“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①。因此,实际上形成了“钞买钞”的局面,即政府通过滥发新币的办法来搜刮民间的至元宝钞;二是发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币通行,这样,也就形成了钱钞通行的局面。“钞乃虚文,钱乃实器,钱钞兼用,则民必舍虚而取实。……而惟钱之是用”^②。最后连钱也不用,“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③。在京师大都,钞十锭(每锭五十贯)买不到一斗粟。

所以,“开河”和“变钞”促使元末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当然,“开河”和“变钞”不能说就是红巾军大起义的根源,真正的根源还是“人吃人”的社会本质。宋濂等认为:“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不此之察,乃独归咎于是役,是徒以成败论事,非通论也。设使贾鲁不兴是役,天下之乱,诟无从而起乎?”^④是有道理的。

二 韩山童、彭莹玉组织起义的秘密活动^⑤

元末农民起义主力红巾军是通过宗教活动来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元人张桢说:“颍上之寇,始结白莲,以佛法诱众……”^⑥《元史·顺帝纪》也说北方红巾军的组织者韩山童出身于白莲会世家,可见,他们利用的宗教是白莲教。南方红巾军利用的也是白莲教。

①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

② 王祿:《帛货议》,《王忠文公集》卷一二。

③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

④ 《元史》卷六六,《河渠志》三。

⑤ 本节写作时参考了杨讷《元代的白莲教》一文,见《元史论丛》第二辑。

⑥ 《元史》卷一八六,《张桢传》。

白莲教渊源于佛教净土宗的弥陀净土法门,得名于五世纪初东晋庐山慧远之白莲社。南宋初昆山(今江苏昆山)人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即白莲教。他们崇奉阿弥陀佛,只要口念阿弥陀佛,死后即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茅子元依据弥陀经典,编写了《弥陀节要》,宣扬“念念弥陀出世,处处极乐现前”^①,认为弥陀、净土乃是修行者明心见性的产物。白莲教的戒律,要求徒众做到三皈(皈佛、皈法、皈僧)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主张素食,故其教徒被称为“白莲菜人”。由于该教教义简明易懂,在广大人民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它受到正统的天台宗僧侣的攻击,志磐在《佛祖统纪》里把明教、白莲教和宋代流行的白云宗一概称为“事魔邪党”,宗鉴在《释门正统》里说:“此三者皆假名佛教,以诳愚俗。”

白莲教在宋亡之前就传到了北方。元朝统一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南北混一,盛益加焉。历都过邑无不有所谓白莲堂者,聚徒多至千百,少不下百人,更少犹数十”^②。“礼佛之屋遍天下”^③。元朝初期对白莲教采取了扶助态度,庐山东林寺受到封赏,昆山淀山湖白莲堂香火旺盛。但是,早在至元十七年(一二八〇年)时就有农民起义领袖利用白莲教发动反元武装起义,当年四月,江西都昌白莲教徒杜万一就曾以“五公符、推背图、血盆”等符篆发动武装起义^④。以后利用白莲教“妖言惑众”的事例不断发生。因而导致了元武宗至大元年(一三〇八年)时白莲教被禁止,“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⑤。韩山童的祖父,可能就在这之后不久,因“以白莲会烧香惑众”,从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谪徙”广平永年县(今河北邯郸东北旧永年)的。元仁宗以后,白莲教虽然恢复,有些白莲教主虽然忠于元朝统治者,但广大的

① 《庐山莲宗宝鉴》卷二,《离相念佛三昧无住法门》。

② 刘壎:《莲社万缘堂记》,《水云村泐稿》卷三。

③ 吴澄:《会善堂记》,见《永乐大典》卷七二四二引《抚州罗山志》。

④ 《通制条格》卷二八,《杂令》。

⑤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白莲教徒仍然以各种形式不断反抗元朝的封建统治。元代流行的“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这首“扶箕诗”^①,虽然很难确定是哪一教派的,但也不排斥在白莲教徒中传唱的可能,因为白莲教也被认为是“事魔邪党”。如果是这样,元代白莲教中对现实不满、追求平等的愿望是存在的。

韩山童出身于北方白莲教世家。其祖父韩学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年县”^②。至山童继为白莲教主后,开始宣传“弥勒佛下生”^③和“明王出世”^④,这就争取了更多的群众,“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⑤,并且拥有一批有能力的骨干,如刘福通、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他们在宣传群众时,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倡言天下大乱”,这就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推翻元朝统治的斗争目标是十分明确的。

彭莹玉(又名彭国玉、彭翼、彭祖、彭和尚,敌人称他为“妖彭”)出身在江西袁州(今江西宜春)南泉山慈化寺东屯庄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十岁时入慈化寺为僧,后因会治病,“袁民翕然,事之如神”,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同时在农民群众中开展白莲教的宣传活动,组织武装起义。至元四年(一三三八年)他与徒弟周子旺在袁州发动起义失败后,“逃淮西,淮民闻其风,以故争庇

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扶箕诗》。

② 《元史》卷四二,《顺帝纪》五。

③ 同上。

④ 高岱:《宋事始末》,《鸿猷录》卷二。杨讷认为,“明王出世”出于净土宗的《大阿弥陀经》,见《元代的白莲教》,《元史论丛》第二辑。按:宋代以来的明教徒亦诵佛教《金刚经》,或非《藏经》所载的“不根经文”,如《佛佛吐恋师》、《佛说啼泪》、《大小明王出世经》、《开元括地变文》、《齐天论》、《五来子曲》之类(见庄季裕《鸡肋篇》、志磐《佛祖统纪》卷三九引《释门正统》),“明王出世”似应来源于《大小明王出世经》,故立此存疑。又,各教派之间互相渗透的情况是存在的,韩山童提出“弥勒佛下生”的宗教口号,显然取自净土宗的另一教派弥勒派,而后至元三年(一三三七年)河南棒胡起义置弥勒佛小旗,又称李老君太子,看来还吸收了道教的成分。

⑤ 《元史》卷四二,《顺帝纪》五。

之,虽有司严捕,卒不能获”^①。此后十余年间,他在江淮地区继续宣传白莲教,成为南方白莲教的“祖师”,他提出了“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的宗教口号,并以此组织反元武装力量。他的门徒遍及江淮地区,早期的门徒,多按白莲教的规定以“普”字命名。他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起义的骨干,而且为农民大起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以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为基本力量,以宗教信仰为纽带的民众团体,在元末农民起义的准备阶段,在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方面曾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由于宗教本身的派系,造成了南北两大派系始终没有统一起来,甚至各个派系内部也有不相统属、孤立分散的现象。大起义爆发后的情况也是如此。南北两支红巾军一直没有统一起来,始终是各自为战的,甚至还发生过互斗和火并,因而大大削弱了红巾军的战斗力。但宗教色彩随着起义的深入逐渐淡薄,政治斗争口号逐渐代替了宗教号召。

第二节 元末农民起义的爆发和暂时挫折

一 韩山童、刘福通首义和元朝统治者的疯狂镇压

贾鲁开河后,韩山童、刘福通等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武装起义。他们一面加紧宣传“弥勒下生”、“明王出世”,一面又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②,同时暗地里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在其背上刻了“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③几个字,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岗附近的河道上。等到独眼石人挖出后,河工们惊诧不已,消息传出,大河南北,人心浮动。韩山童等

① 权衡:《庚申外史》。

② 《元史》卷六六,《河渠志》三。

③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利用开河的机会,借独眼石人来鼓动造反,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至正十一年五月初,韩山童与颍州(今安徽阜阳)人刘福通联合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聚众三千人于颍州颍上县^①,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准备起义。刘福通等宣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刘福通自称南宋将刘光世后代,当辅之^②。韩山童则发布文告,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称塞北。”^③这是假托南宋广王赵昺走崖山、丞相陈宜中走日本的故事,来达到“复宋”的目的。至于“贫极江南,富称塞北”,则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了。“贫极江南”,主要是指汉族劳动人民的贫困化;“富称塞北”,主要是指蒙古、色目贵族对土地的占有和财富的搜括。因此,汉族劳动人民反对元朝的黑暗统治,不仅具有反对民族压迫的性质,而且也是贫富之间,即阶级之间斗争的性质。他们还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战旗^④,表示推翻元朝,恢复大宋的决心。韩山童等人的号召,对广大汉族劳动人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是时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⑤。

但是,正当起义准备举行的时候,消息走漏了,地方官派兵前来镇压,韩山童被捕牺牲,其妻杨氏、子韩林儿逃到武安(指武安山,在今江苏徐州境)。刘福通等逃出重围,再次起兵,于五月初三(辛亥)一举攻下颍州,大起义正式爆发。由于起义军头裹红巾为标志,故称红巾军;起义军多为白莲教徒,烧香拜佛,故又称香军。

红巾军占领颍州后,元廷立即派遣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素号精悍,

① 何乔远《名山藏·天因记》载,刘福通等在白鹿庄誓告天地,按白鹿庄今地无考。《庚申外史》说刘福通等起兵地点在颍州颍上县。民间传说,刘福通起兵地点在今安徽阜阳市阜东枣庄集。

② 何乔远:《名山藏》卷四三,《天因记》。

③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④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旗联》。

⑤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善骑射”的六千阿速军及各路汉军，又令河南省徐左丞协同前往镇压。这三个元将“但以酒色为务，军士但以剽掠为务”，赫厮军马看见红巾军势大，扬鞭高呼：“阿卜！阿卜！”（快跑！快跑！）逃跑了。于是刘福通很快占领亳州（今安徽亳州）、项城（今河南项城南）、朱皋（今河南固始北）、罗山（今河南罗山）、真阳（今河南正阳）、确山（今河南确山）等地。九月，刘福通攻占汝宁府（今河南汝宁），又克息州（今河南息县）、光州（今河南潢川），众至十万。

在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全国各地纷纷起兵响应，在北方地区的主要有芝麻李（即李二）等起于徐州，布王三（即王权）、孟海马等起于湘汉流域、郭子兴等起于濠州（今安徽凤阳）。

至正十一年八月，邳州（今江苏邳县北）人^①李二（因家有芝麻一仓，饥荒时赈济饥民，故有“芝麻李”之称）与社长赵君用、樵夫彭早住及其父老彭等亦以“烧香聚众”而反，攻占徐州。未几，又占领徐州近县及宿州、五河、睢宁、虹县、丰、沛、灵璧、安丰（今安徽寿县）、泗县等地。

至正十一年十二月，王权（可能是布商，故有“布王三”之称）、张椿等攻占邓州（今河南邓县）、南阳（今河南南阳），称“北琐红军”，未几，占领唐（今河南唐河）、嵩（今河南嵩县）、汝（今河南临汝）、河南府（今河南洛阳），进逼滑（今河南滑县东）、浚（今河南浚县）。至正十二年正月，孟海马等攻占襄阳（今湖北襄樊），称“南琐红军”。接着又取房（今湖北房县）、归（今湖北秭归南）、均（今湖北均县西北）、峡（今湖北宜昌）、荆门（今湖北荆门）等州。

至正十二年（一三五二年）二月，定远富豪郭子兴与农民出身的孙德崖、俞某、鲁某、潘某等四人起兵，攻占濠州，郭子兴等称元帅。闰三月，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来投郭子兴。

与此同时，南方各地的红巾军也纷纷起兵，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战果。

起义农民取得的重大胜利，严重威胁着元朝的封建统治。元朝统治者

^① 《庚申外史》。《元史·顺帝纪》作萧县人。

调动他们的所有武装力量,向农民起义军猛扑过来,进行残酷的镇压。从至正十一年九月至至正十四年(一三五四年),北方的战争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今皖西北豫东南地区、徐州地区和南阳襄阳地区。元朝军队凭借武器装备的优势,勾结地主武装,镇压了徐州芝麻李的起义军和布王三、孟海马的北琐红军和南琐红军,因而使刘福通领导的主力红巾军受到了限制,未能进一步得到发展。

刘福通领导的主力红巾军,始终是元廷的“心腹大患”。至正十一年九月,元顺帝令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卫王宽彻哥率诸卫兵十余万人前往镇压。十月,又加派知枢密院事老章增援也先帖木儿。十二月,元军攻陷上蔡,起义最早的领导人之一韩咬儿被俘杀害。至正十二年三月,元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太不花攻陷汝宁,元知行枢密院事巩卜班率数万侍卫汉军、爱马、鞑靼军屯驻汝宁沙河岸,他们为暂时的胜利所陶醉,日夜沉溺于酒色,刘福通乘其不备,偷袭元营,巩卜班战死,元军退驻项城。不久,也先帖木儿驻军沙河,巩卜班的下场使元军提心吊胆,某夜,军中夜惊,也先帖木儿尽弃军资器械、粮草、车辆,数万散兵逃至开封,也先帖木儿被撤职。元军经过这次不战自溃后,对刘福通起义军的围剿稍稍放松一些,而把主要力量放在镇压它的两翼——徐州地区的起义军和南阳、襄阳地区的起义军上。但是,红巾军的死敌、两支凶恶的地主武装,正在这时崛起于豫东。这就是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察罕帖木儿,畏兀儿人,其曾祖于元初开始定居河南,察罕帖木儿为沈丘探马赤军;李思齐,罗山人,为罗山县典官。刘福通起义后,他们纠集地主武装,号称“义兵”,袭破罗山,大受元顺帝的赞赏,授察罕帖木儿汝宁府达鲁花赤,李思齐汝宁府知府。后来,“义兵”进一步扩大,达万人,屯兵沈丘,对刘福通起义军是极大的威胁。

芝麻李等占领徐州后,起义军发展至十余万人,占有徐州附近的许多州县。至正十二年正月,元顺帝令逯鲁曾为淮东添设元帅前往徐州镇压芝麻李。逯鲁曾主要依靠两淮所募的三万名盐丁组成的“黄军”对徐州城进行了包围。

八月,元中书右丞相脱脱为捞取战功,亲自督制诸处军马,出师徐州。九月,徐州城破,元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芝麻李等遁走。月余,芝麻李被元军捕获,惨遭杀害^①。彭早住、赵君用等率余众逃奔濠州。脱脱命贾鲁等攻濠州,不久,贾鲁病死。五月,元兵撤离濠州。至正十三年,彭早住称鲁淮王,赵君用称永义王,权在郭子兴之上。明年,彭、赵取盱眙、泗州等地。朱元璋与之不和,分兵南略滁阳。

布王三、孟海马的北琐红军和南琐红军,也拥有起义军十万,他们活跃在南阳、襄阳及汉水流域的广大地区内。元朝统治者自至正十二年闰三月起,先后派遣了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四川行省参知政事答失八都鲁,诸王亦怜真班、爱因班,参知政事也先帖木儿、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以及豫王阿剌忒纳失里、知枢密院事老章等分几路“围剿”。五月,答失八都鲁依靠地主武装攻陷襄阳,布王三不幸被俘,北琐红军先被镇压。答失八都鲁等继续镇压孟海马的南琐红军。至正十四年正月,答失八都鲁攻陷峡州,南琐红军亦被镇压。

二 南方红巾军起义和天完政权的建立

刘福通在颍州发动起义成功后,对在江淮一带从事秘密活动的彭莹玉及其徒弟们鼓舞很大,他们认为发动起义的时刻已经来到。至正十一年八月,麻城(今湖北麻城)人、铁工邹普胜,罗田人、布贩徐寿辉等首先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南)发动起义。他们宣传“弥勒下生,当为世主”,烧香拜佛,起义农民头裹红巾,所以也称红巾军,共推体态雄伟的徐寿辉为主。十月,起义军攻克蕲水(今湖北浠水),并以蕲水为都,建立了政权,国号天完^②,改元治平,徐寿辉称帝,邹普胜为太师。“天完”是压倒“大元”的意思。

① 据《庚申外史》。又杨仪:《垒起杂事》载:“芝麻李之遁也,髡发为头陀僧。”

② 据新发现之《玄官之碑》,国号宋,且系于岁庚寅(一三五〇年),待考。

天完政权是元末农民起义中建立最早的农民政权。它的行政机构和管军机构设置是比较完备的。行政机构设有中书省(称莲台省)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①。其军制,则有百户、千户、万户、总管、统军元帅等职,并有管军万户府、管军总管府,统军元帅府等管军机构^②。天完政权的行政和管军设施,对于打击和镇压阶级敌人,维护社会治安,保证起义军的严格纪律和战斗力,巩固新生的农民政权,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天完政权的建立,使原来以宗教为纽带联系的南方各地的白莲教徒,现在有了自己的政治中心,纷纷在天完政权的指挥下,响应起义。

天完政权建立后,南方的起义形势发展极其迅猛。为了扩大战果,起义的领袖们分兵四出,给元朝在南方的封建统治极其沉重的打击。从至正十二年正月开始,天完政权先后派丁普郎、徐明达攻克汉阳、兴国(今湖北阳新),邹普胜攻克武昌、龙兴(今江西南昌),曾法兴攻克安陆(今湖北钟祥)、沔阳(今湖北沔阳西南)、中兴(今湖北江陵),欧普祥攻克袁州,陶九攻克瑞州(今江西高安),陈普文攻克吉安,周伯颜一支经江西,入湖南,抵广西,王善进攻福建。彭莹玉、项普略(又名项甲、项奴儿)一支则东去江西,到安徽,抵浙江,又折回苏南、安徽、江西,这支起义军活动范围最广,战斗最激烈,建立的功勋也最大,是天完政权初期最有代表性的起义活动。天完政权通过分攻州郡的战略,形势大变,红巾军攻城夺池,“官军多疲懦不能拒”,所在贫苦农民纷纷响应,“不旬日,众辄数万,皆短衣草屨,齿木为杷,削竹为枪,截绯帛为巾襦,弥野皆赤”^③。如安徽巢湖地区的赵普胜、李普胜等,江西新淦的邓克明、邓志明,丰城的李明道,瑞州的邓南二,福建建宁的应必达,福建福安、罗源、古田县的农

① 《隋唐以来官印集存》,民国上虞罗氏影印本。收有天完政权颁发的“统军元帅府印”一方,印背左侧刻有“中书礼部造”,“治平四年 月 日”。可见天完政权有中书省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设,但根据起义斗争的需要,六部未必全设,或开始并未全设。

② 参见邱树森:《元末红巾军的政权建设》,《元史论丛》第一辑。

③ 《元史》卷一九五,《魏中立传》。

民领袖林君祥等等,他们或本身是白莲教的信徒,起兵响应;或本来不是白莲教徒,响应起义后投靠红巾军。甚至湖南、广西的少数民族也配合红巾军进行作战。因此,元朝官吏余阙也不得不承认:“余出乱中,以观南方之民,或盗至而乱,或未至而迎降”^①。

南方红巾军之所以取得如此重大的发展,这是与他们明确的政治斗争纲领分不开的。据记载,至正十二年四月,江西宜黄的红巾军首领涂一、涂祐,新城红巾军首领童远攻占建宁(今江西建宁)、泰宁(今福建泰宁),不久,进入邵武(今福建邵武),他们“扬旗执榜”,宣传“摧富益贫”,深受贫苦百姓的欢迎。地主分子污蔑说:红巾军首领“扬言‘摧富益贫’以诱村畛从逆。凡窳者之欲财,贱者之欲位,与凡子弟之素无赖者,皆群起趋之。旬日间,聚至数万,大掠富民家,散入山谷搜劫,无获免者”^②。“摧富益贫”,这是南方红巾军领袖们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的响亮的反封建口号。这个口号突出了一个“摧”字,即用暴力去实践他们争取社会平均和平等的主张。在“摧富益贫”的口号鼓舞下,世世代代受压迫、被剥削的“贱者”、“窳者”,挣脱了封建枷锁,“不愿为农愿为‘盗’”,纷纷参加起义,投入浩浩荡荡的起义洪流中去。

彭莹玉在自己的战斗历程中,也是遵循“摧富益贫”的口号的。他无疑是南方最有权威的白莲教首领和农民领袖,在发动了后至元四年(一三三八年)周子旺起义、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年)徐寿辉起义两次农民起义并建立了政权后,他始终没有自己去称帝,而是浴血奋战在战斗第一线。至正十二年二月,彭莹玉率军占领江州(今江西九江),杀元江州路总管李黼。接着攻克南康(今江西星子)、饶(今江西波阳)、信(今江西上饶)。四月,挥师入安徽境,克婺源、黟县、休宁和徽州(今安徽歙县)。在这一带,主要遭遇了地主武装的拼死抵抗,其中休宁的大地主汪同、程国胜、俞茂等纠集一支“义兵”,依

① 余阙:《青阳县尹袁君功铭序》,《青阳集》卷六。

② 嘉靖《邵武府志》卷二,黄镇成撰碑。

据山谷,控制险要,威胁很大。六月,彭莹玉、项普略率军攻破昱岭关,进入浙江。七月,在当地贫苦农民的支持下,攻克江浙行省首府杭州,元江浙行省的官员纷纷逃窜,参政樊执敬自杀。彭莹玉的军队,纪律严明,“不杀不淫”,一面继续宣传“弥勒佛出世”,号召人民参加红巾军,“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一面把府库金帛没收归红巾军所有^①。但是,红巾军在杭州并未站稳脚跟。元朝统治者决不甘心富庶的东南地区让红巾军占领,元顺帝急令江浙行省平章教化和济宁路总管董抟霄等从濠州撤围,联合江浙行省平章三旦八向杭州扑去。彭莹玉等被迫撤出杭州,退守徽州。教化、三旦八、董抟霄及当地的地主武装死死缠住不放。为摆脱敌人的“围剿”,彭莹玉等选择了北上广德(今安徽广德),进兵苏南的办法来摆脱元军。九月,红巾军攻克广德。十月,攻占常州。在常州,彭莹玉率领红巾军夺取大地主王“佛子”的钱财,发其仓廩,分给贫苦农民^②。接着又攻取江阴、宜兴、溧水、溧阳、丹阳、句容,并遣军向集庆(今江苏南京)试探。这时,元军已麇集集庆周围,在这样的形势下,红巾军再留在苏南是不利的,彭莹玉不得不再次返回徽州。但徽州已经失守,项普略被俘牺牲,彭莹玉在巢湖水师赵普胜的支援下再克徽州。至正十三年春,徽州失守,彭莹玉只好退到江西瑞州(今高安)。至正十三年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右丞火你赤包围瑞州,彭莹玉等红巾军首领全被捕杀^③。

除了彭莹玉这支起义军遭到镇压外,其他各支红巾军后来也遭到了暂时挫折。徐寿辉建立政权并占领武昌后,元顺帝调遣南方各省军队从四面八方来“围剿”起义军,其中以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临秃、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颜帖木儿、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等蒙古、色目贵族最为凶狠,他们“贷富人钱,募人为兵”^④,利用汉族地主武装,共同对红巾军血腥镇

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八,《刑赏失宜》。

② 谢应芳:《王佛子行状》,《龟巢稿》卷一九。

③ 正德《瑞州府志》卷一一,《遗事志》。此书彭莹玉作彭国玉。

④ 《元史》卷一四四,《星吉传》。

压,致使红巾军占领的许多城市得而复失。特别彭莹玉战败牺牲后,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到至正十三年十二月,元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颜帖木儿、南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及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临秃、左丞秃失里、西宁王牙罕沙等联合进攻天完的都城——蕲水,蕲水终于陷落,天完政权的四百多名官员惨遭屠杀,徐寿辉等被迫“遁入黄梅山中及沔阳湖中”^①。

蕲水的失守,使南方红巾军起义受到了很大的挫折,起义活动一度处于低潮。连响应徐寿辉、彭莹玉起义的拥有百万之众的巢湖水师也受到了影响。

彭莹玉长期在江淮一带秘密传教,组织武装起义队伍,所以,至正十一年八月彭莹玉领导的蕲州起义爆发后,“江淮人多应之”^②。巢湖周围主要有三支较大的起义军:一支是赵普胜领导的,一支是金花姐和李普胜(即李扒头)领导的,一支是左君弼领导的。其中左君弼领导的一支于至正十四年攻占庐州,以后就没有多大发展,并投降了元朝,后来又归附朱元璋;金花姐和李普胜一支活动范围较广,其部下有俞廷玉、俞通海父子,廖永安、廖永忠兄弟等,金花姐牺牲较早,这支起义军由李普胜领导并与赵普胜合作;赵普胜一支则势力最大。

赵普胜,巢县(今安徽巢县)人,善用双刀,故号“双刀赵”。蕲州起义爆发后,赵普胜以巢湖为根据地,积极发展水军,势力很大。彭莹玉率军攻克江、饶、徽、信等地后,赵普胜则出师南下,与之配合。至正十二年春,赵普胜的水军先破无为(今安徽无为),威胁繁昌(今安徽繁昌西北),占领铜陵(今安徽铜陵)、池州(今安徽贵池),进而围攻安庆(今安徽安庆)。元廷急命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颜帖木儿、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儿、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等调兵堵截赵普胜的起义军,但元军遭到惨败,赵普胜占领了湖口(今江西湖口)、彭泽(今江西彭泽)一带,并夺取了安庆。到

① 权衡:《庚申外史》。

② 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二,《俞通海传》。